



周光祺 著

我这一辈子

充满色彩的回忆，旧日的时光
姗姗而来，用细腻的笔调描绘岁月的
印记……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周光祺 著

我这一辈子

充满色彩的回忆，旧日的时光
姗姗而来，用细腻的笔调描绘岁月
的印记……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这一辈子/周光祺著.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605-5537-9

I. ①我… II. ①周… III. ①周光祺—回忆录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9391号

书 名 我这一辈子
著 者 周光祺
责任编辑 周 冀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10号 邮政编码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82669096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西安明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4.375 字数 84千字
版次印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5537-9/K·93
定 价 1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
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 (029) 82665248 (029) 82665249

投稿热线: (029) 82668531

读者信箱: xjtu_hotreading@126.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 前言

reface

在我国近代史中，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大踏步地走上空前繁荣昌盛的年代。而这个新中国的产生，却远非现在的年轻人所能想象的那样轻松愉快和唾手可得。

从1937年我进初中起，正值日寇大举侵略我国即将进入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包括我的祖籍江苏在内的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被日寇占领。汪精卫伪政权为了收买人心，以优厚待遇为诱饵，吸引青年学生到敌占区的城市就读。与此同时，上海、江苏等地的各大名校，如上海中学、苏州中学、镇江中学、扬州中学等为爱国师生则纷纷撤离敌占区，迁移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国土上。

就这样，我的家乡江苏泰兴的北部农村后来竟成为中学名师汇聚的胜地，我也因祸得福为我的初、高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944年高中毕业时，我以《沦陷区优秀学生保送条例》的名义被保送到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重庆，可进入任何国立大学就读，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在当年10月之前报到。

从江苏到重庆，不仅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且要

冒险穿过敌人的多条封锁线，还要避开正在发生战争的地区。就这样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才到达了目的地。

我一直认为，我们老一辈人这样的经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但又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基本教材。它教育我们，世界并非总是美好的，要能像样地活下去，每个人都必须作出他应有的努力。这就成为我撰写《我这一辈子》这本书的出发点了，但愿我能如愿以偿，给每位读者一些启迪和感悟。

我的故乡

我的祖籍是江苏泰兴，这是一个距长江北岸不到十公里与常州隔江相望的小县城。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直到高中毕业去重庆时我才乘船绕道镇江踏上过常州的一段土地。而现在乘公交车走高速公路直达上海五角场也不过两个多小时。

过去我们家距离老县城大约一公里多一点，是农村地区。后来县改市扩大市区后就变为城市地区了。可是不管怎么变化，我对生长和养育我





我

这壹辈子

的那个村庄及其周边环境的眷恋之情，始终无法改变。

一个不大的村庄，由东到西，坐北朝南，大约由四十家农户组成，多数人家盖的是瓦房，村子四周流淌着直通长江的河流。村前村后的布置几乎是统一的：屋后全是竹林；屋前依次是打麦场、道路、菜地、果树园，直至汰洗专用的南河边；饮用水则来自专用的水井。村外还另外开挖了一个大约十多亩水面的养鱼池，承包给本村人，年底给各户分鱼。

这个村庄主要由“卜”姓和“周”姓两个家族组成。在我祖父这一辈时，卜姓人家有五房（即有五个儿子独立门户），周姓则有四房。我小时候居住的那套房子一共有三进（三排），每进六间，外加厢房，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很像样子的。但是等我老祖父去世后四兄弟分家时就显露出了矛盾：每进六间分隔成四家，再参照厚长薄幼的老规矩和已有孙子的人数及年龄，我祖父这位老大就分到了每进6间中的1.75间，而最吃亏的是老四这一家，他们的每进的宽度只有1间多一点。

解放后经过历次运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上述的故乡旧景已成梦幻泡影，代之而起的是独家独户的多层楼房，人们的生活已获得实质性的大幅提高。

父辈

写这一部分我原本有点顾虑，因为写这类材料既不



能夸大其辞，又必须实事求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很多事是我幼年时看到或听说的，或者是事后别人告诉我的，难免有偏听偏信之嫌。可凑巧前不久我收到从南京发来的一份材料，是一位姓卜的村民（他现在有可能并不住在我们那个村庄上）写的关于村上各式人等的介绍和评价。他写的内容与我的记忆基本一致，这就增强了我写下去的信心。

我们村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各家的生活均来源于自耕地。无论是卜姓或是周姓人家，每家都有十多亩地，只要不碰上天灾人祸，日子过得还算得上殷实。这里没有人家用得着或用过长工，以至于解放后土改时连一家富农都很难找得出来。

从我父亲这辈子起，由于军阀混战，兵乱时起，打乱了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人们开始要为自己和后代谋划出路。此前，相对于周姓人家而言，卜姓人家原本就不重视读书，而从那时起，周姓人家就开始谋求接受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式教育了。首先是我大伯被送往外地去上“洋学堂”，是到南通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已记不清楚了，只隐约记得他那言谈风雅和举止端庄的高大身影。我父亲则被送到江南的吴江乡村师范学校学习。至此，我们这一房的各家都已具备了从事脑力劳动工作的条件了。老大房中的我大伯和我父亲，老二房中的我叔父等人，都大半辈子在本村或外村开办私塾，以最低的费用，广招农村的孩子入学接受基础教育。既教四书五经，也读现代课本。我的文言文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我们这一





房中还出了一位颇有水平的老中医，去过新加坡等南洋地区行医。

农民协会

1927年之前的国共合作期间，我父亲是国民党员，并担任过区党部委员和城西区的乡长。那时我只是个几岁的小孩，对大人们搞的许多新鲜活动特别感兴趣，但又完全听不懂。例如，多次召开过的农民协会，而且是在我家门前召开的。小孩最有兴趣的是那些红红绿绿的旗帜和大头人像，不管大人们怎样呵斥，他们总是围绕着会场吵闹。

其实，不仅孩子们听不懂大人们在说什么和在干什么，就连一些老农民也搞不清楚。这应该说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一辈子的活动范围超不过百里。就连本县的东乡人与西乡人说话，也未必就能全听懂。但是外地来的客人多了，他们也逐渐有了识别这些人的土办法了。他们把说话带唇音的南方人统称为“蛮子”，带喉音的北方人统称为“侉（音跨）子”，即南蛮北侉。

对于我们自己的话该怎样划分呢，他们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将它划分成蛮子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还要称之为“平声蛮子”。因为在这里人的讲话中，对“平上去入”的四声一概不加区分，都读成平声。不仅如此，在我们的语言中竟然舍弃了卷舌音，



以至于后来在我查字典时就增加了麻烦，直到目前都无法完全改变。

可是在有外乡人参加的会议中，乡土语言是不行的，你必须逼着自己讲“普通话”。但是这样又给当地的老农民带来了不便，尤其对于一些新名词总是无法理解。例如，“农民协会”中的协会二字是什么东西呀，他理解成“屑灰”。因为在我们的方言中“屑”是“粉”的意思，小麦粉就叫小麦屑，荞麦粉就叫荞麦屑。现在既是屑又是灰的，还要叫人揩灰（开会），不是蛮干净的吗，不知道在搞啥名堂。

正当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时，一个姓丁的老农民突然大声喧叫“什么农民屑灰呀，我们这里只有荞麦屑灰！”引起了一场轰笑。事后经我父亲耐心解释，总算是搞明白了。不过，此后丁老爹却多了一个外号，那就是“荞麦屑灰”。

国共分裂之后

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分裂。泰兴的国民党县党部被解散，要求党员在整顿后重新登记。我长大后听我父亲说，他对党派之争毫无兴趣，只是想为家乡做点事而已。整顿后国民党要他重新登记，并继续担任本乡的乡长。但他对国民党的大屠杀政策非常反感，这和轰动全县的共产党人马老东慷慨就义高歌赴刑场的事迹有关。





我

这壹辈子

此后他坚决辞去了乡长的职务，并不再登记为国民党党员，而是回家教书和种田去了。乡长一职改由邻村一个名叫龚斐然的人担任。此君看起来一表人才，我父亲和他比起来简直是个土包子。他十分讲究衣着，尤其是在夏天的农村里，他总是穿一身洁白的绸长衫，还能说一口洋气的话。可是后来他却变成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卖光了家里的田地和房屋，最后饿死在县城的城隍庙里。为此，我还随大人进城看了一次热闹。

我父亲经常利用这些事例来教育我，要做老实人，不要过问政治，不参加任何党与派。当然，读好书是最重要的，读书学到本领才能为国所用。要有能上大学的抱负，而且是学实科，即后来的理工科。幸好，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具备，这些我后来都做到了。

我的这一辈子

我出生于1923年3月21日，属相为猪。据说属猪的人福大，但是我们的亲友却暗地里为我能否活下去担忧。这是因为在庆祝满月的那天正逢清明节，这是民间踏青扫墓的日子，不是很吉利的。加上那天为满月放鞭炮时把我家的一口大水缸炸破了，更引起了迷信人的忧心。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我的“官方年龄”是1924年出生，连我的身份证也是这样写的。其实，这是错



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这样的：在填写小学毕业证书时，老师因考虑到农村人习惯用虚年龄而一律减小一岁，并自行填写好了证书，虽经我说明但已无法改变。从此以后也只能以讹传讹，一直沿用至今。

不管怎么说，我的童年还是很幸福的。但紧随着国运的衰落与振兴，我个人的命运也跟着跌宕起伏。但是与我们的前辈相比，我们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正逢国家兴旺发达的晚年。试想一下我们的前辈如张鸿，陈大燮，沈尚贤等交大老教授，他们辛辛苦苦地忙了一辈子，到头来只落得个吃苦受难是本分，而享福即使在梦中也可能都没敢想过。

不平凡 的 1937 年

1937年的不平凡，不仅在于淞沪抗日战争的开始，还在于它是我这一辈子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我考取了当时泰兴唯一的一所县立初级中学，尽管还只是“备取”，能不能真正取上还有待县中的通知。但这却成了轰动城西区几十里范围内的特大新闻，因为我是城西区唯一能考上县中的乡下孩子。这件事其实也很简单，乡下孩子上的是教学水平低得多的农村小学，考起中学来自然就比不过城里的孩子。另一方面，考上泰中的城里孩子有一些还会去沪宁一带上学，因此我去上泰中的可能性会很大。果然不久泰中通知我去报到，我是备取中的第七名。





报到中的最大难题是学费，初一新生要交40大洋（银元），这个数字简直要吓坏人。因为按当时的小麦价钱来计算，老秤200斤为一石（读“担”），每石价约3元，这就是说要拿出十几石的小麦来才能交上学费，这远远超出了我家的实际能力。在这关键时刻，我的大伯和二叔等人伸出了援助的手，帮我解决了这一难题。

我决定走读，早出晚归，中午花两个铜元（1银元合200个铜元）买两个烧饼充饥。我还记得从我家走到城东门学校所在地大约有五到六公里，途经北门外的张家山（1958年大跃进时已被挖平），早上进城的人多不会有问题，晚上回来迟了会碰上野狼，两相对峙，末了总是以我的大声呼叫把它们吓退而告终。我最害怕的还是我们村南面的那个长约200米的“乱葬坑”，这是穷人家草率掩埋未成年孩子的地方；埋下以后的尸体常常被野狗刨出去吃了，几年前我们瞒着大人一同下河游泳而被溺毙的一个小伙伴就被埋在这里。夜里单独走这段路我很害怕，但我知道这个死去的伙伴生前最害怕的是狼，于是每经过这里我都学着狼嚎，用百米赛跑的速度冲刺而过。

泰兴县立初级中学

我到泰中报到时他们已经上课一个多星期了。我们的座位安排是女生在前，后面的男生按身高依次排



列。我们班上最矮的是季恒希同学，我是第二，我们俩同坐在一个课桌边。万万没想到，他就是1942年我们高中毕业后去重庆升学路经江苏溧阳时被日本鬼子斩首示众的季恒希啊！

我们的英语课是每天都有的，讲课的陈仲颖老师既教历史又教英语。他对学生非常严格，凡是回答不了问题的学生都要罚站；60人的班一课下来，可能会有一半甚至更多的人被罚。要知道被罚站对年轻人来说是很不体面的，因此大家都很紧张，但是愈紧张又愈容易出错。在这种情况下我被罚站是必然的，因为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没有学过，而陈老师又并不从头教起。

于是我求教于班上一位年长的同学，学会字母的读音和简要的拼读方法，每课前都要对课文进行预习，并力求熟练。等陈老师再对我提问时，我立即对答如流，从而引起他的惊奇并大加表扬。此后我不仅离开了被罚站的队伍，而且还经常被陈老师指定为代为解答问题的帮手。不久，我的“事迹”传到其他班级，我一下子变成学校的“名人”了。

小孩是爱听表扬的。“不过，可不能骄傲喔！”这是父亲对我的警告。于是我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继续加倍努力；不仅是英语课，所有的课都要努力。对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不仅要做得对，而且要写得力求工整。想不到这样做又出了“麻烦”：各门课的老师都相继把我的作业公布出来，作为同学们的表率，让我在全校都出了名。说这是麻烦那倒是真的。首先我必须时





我 这壹辈子

时处处谨言慎行，因为外班的同学总是像看稀有动物那样盯着我看，让我很不自在。甚至到体育场练习篮球投篮时，别人投不进无所谓，我投不进就会引起全场小观众的哄笑，而我的投篮技术又实在太差。

当然也有一些让我高兴的事发生，其中交到了一些好朋友就是最值得庆幸的。例如我们班的（现已逝世）周钧禾同学，他是城里人，他的学习成绩原本也是很好的，但老师很少表扬他，为此他很不服气。后来我注意学习他的优点，我们就逐渐成为好朋友了。此后他经常邀我到他家住宿，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他后来毕业于中央大学冶金系，最后的工作单位是上海重机厂。可惜他去世较早，让我失去了一位知音。

还有葛宝珠、葛锡麟姐弟二人，他们也经常邀我到他们家住宿，名义上是请我帮助他们复习功课，但实际上是认为我是个可交之友。

艰难的初中生活

在城里上学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活上与其说是艰苦的，不如说是相当稳定的。但是在七七事变之后，随着上海南京等地的失陷，193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艘停泊在长江岸边的日寇小炮艇突然向泰兴县城方向进行炮击，引得人心惶惶，城里人纷纷往乡下逃难。随后泰兴中学也迁到了距离县城约十多公里的农村，利用那里的庙宇作为课堂，学生则散居在农民



家中。

对我们学生来说，这时就出现了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与谁同住在一起，二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对我来说，前一个问题解决得很顺利，因为班上许多人都在争取和我同住。我首先选择了我的终身挚友朱焕新（后来他成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他的资质远胜于我。再有就是富有数学头脑的程文可和中文水平特高的陈东莱。我们四人租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吃饭需要自己烧，这可让我们犯了难，因为谁都没有自己烧过饭。

我们想出了一个烧大米稀饭的绝招。大米加上水在大铁锅里烧开一会儿就成大米稀饭了，程序很简单，此其一。其二，大米很吸引人，我们那里过去只产小米，要吃大米饭只能到西乡外婆家去。这种情况直到1958年大兴水利之后才得到根本改变。

大米稀饭就萝卜干虽然简单，但顿顿如此，天天如此，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是很糟糕的。与我父亲，尤其是与我祖父辈的高大身材相比，我显得过分矮小，成年以后也只有1.65米。

好在我从小就爱体育锻炼，而我们同住在一起的四个人也都有这样的共同爱好。我们四个人还有一个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生活习惯，那就是爱开夜车，通宵达旦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开夜车干什么？当然是赶功课喽！但不是老师布置的练习之类的作业。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那是“小儿科”，几乎可以一挥而就。





我

这壹辈子

我们感兴趣的是朱老弟提供的各式各样的练习题，其难度往往要超出应有水平很多。例如，当我们在学小代数时，提供给我们的是大代数上的练习题，如此等等。题目下来之后四人争相试做，看谁完成得最快。如果自己未得到第一名，就要求再出一道题，如此等等，就这样能不通宵达旦吗？有一次正争得起劲的时候，忽听得几声鸟叫，一看天已经麻麻亮了。于是大家一致决定：出门，跑步走！

日本鬼子来了

1938年日本鬼子终于打进了泰兴城。一般认为，从江南来的日军会从南门或西门进来，因此为数不多的中国军队就从北门撤出。殊不知日本鬼子真的很“鬼”，他们偏从北门攻城。当中国军队刚过北门桥不远，两军相遇。鬼子的几排枪响，把我们原本就缺乏战斗力的地方部队打倒了一大片。接着就对我们的伤兵捅刺刀，暴行之残酷真是骇人听闻。

那天我正好在自己家里，听说我们有个伤兵被丢弃在一条河沟里，我立即跑去找到了他。我的天哪，太残忍啦！一个中国兵漂浮在湖面上，脖颈被全部割开，唯独气管还被留着。他发出微弱的哦哦声，似乎想引起路人的注意。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自然无法帮助他，我只能跑到附近村庄上找人去救他。可是等我们回到河边时，他已经沉入水底了。时隔70多年的今天，这一凄

